

批判吉尔平霸权稳定论的霸权稳定

张伟杰

北京语言大学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中国·北京 100083

摘要: 吉尔平的霸权稳定论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新现实主义的代表性理论, 提出了“霸权存在→国际体系稳定; 霸权衰落→国际体系动荡”的核心命题, 深刻影响了西方学界对国际秩序的理解。然而, 本文通过对该理论体系的系统性批判发现, 吉尔平的理论建构存在多重内在矛盾: 在权力界定上过于偏重物质层面而忽视合法性维度; 在公共产品供给分析中陷入“搭便车”悖论; 在霸权周期与战争关系的论证上带有循环论证色彩。

关键词: 霸权稳定论; 罗伯特·吉尔平; 国际秩序; 合法性危机; 公共产品; 权力转移

Criticism of Gilpin's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The Stability of Hegemony

Zhang Weiji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China Beijing 100083

Abstract: Gilpin's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as a representative theory of neorealism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posits the core proposition that "hegemony exists → international system stability; hegemony declines → international system instability", profoundly influencing the Western academic understanding of international order. However, through a systematic critique of this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is paper discovers that Gilpin's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is fraught with multiple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it overly emphasizes the material aspect in the definition of power while neglecting the dimension of legitimacy; it falls into the "free-rider" paradox in the analysis of public goods supply; and it exhibits a circular reasoning in the argument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gemonic cycles and war.

Keywords: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Robert Gilpin; International order; Legitimacy crisis; Public goods; Power transition

0 引言

自 20 世纪 70 年代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提出“霸权稳定”思想, 并经罗伯特·吉尔平系统化完善后, “霸权稳定论”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新现实主义的核心理论之一, 深刻影响了学术界和政策界对国际秩序的理解。该理论认为, 单一霸权国的存在与主导是国际体系稳定的关键, 霸权国通过提供安全、自由贸易体系和稳定国际货币等公共产品来维持秩序。二战后美国霸权的确立和冷战时期的美苏两极对峙为这一理论提供了历史依据。然而, 随着 21 世纪国际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 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和美国相对实力的下降, 吉尔平的霸权稳定论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本文旨在系统性批判吉尔平的霸权稳定论, 分析其内在矛盾与局限, 并探讨替代模式, 以期为理解当代国际秩序转型提供更为多元的理论视角。

1 吉尔平霸权稳定论的理论内涵

吉尔平的霸权稳定论建立在新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设之上, 其理论体系包含对霸权本质、稳定机制和演变规律的独特理解。要批判这一理论, 首先需要厘清其核心概念与

逻辑结构。

1.1 霸权稳定论的理论渊源与核心假设

霸权稳定论的理论源头能够追溯至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针对国际公共产品供给问题所展开的思索。金德尔伯格在剖析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时表明, 国际经济模式要保持稳定就需要有“稳定者”, 然而在那个时期, 英国霸权走向衰弱, 美国又不愿意承担相应责任, 这使得全球危机持续了很长时间。吉尔平在金德尔伯格的基础之上, 把这一经济分析框架延伸至国际政治安全领域, 进而形成了更加成模式的霸权稳定理论。

吉尔平理论的核心假设展现出了浓厚的新现实主义色彩。首先, 国际社会处于一种无政府的状态之中, 并没有最高权威能够保障秩序、安全, 在这种状态下, 权力分配便成为决定国际关系格局的首要要素。其次, 国家属于理性的行为体, 其对外政策是基于成本收益计算的, 霸权国愿意承担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成本, 原因在于其从中获取的收益要大于支出。再次, 国际模式的稳定取决于权力分配的集中程度, 当权力高度集中在单一霸权国之时, 模

式最为稳定,当权力分散至多个大国的时候,模式趋向不稳定。

在这些基本假设之下,吉尔平把霸权定义成了“单独掌控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规则与安排的这样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在军事和经济这类物质方面有体现,同时也涵盖了塑造国际规则、设置议程、影响他国偏好的非物质力量。吉尔平虽说认可非物质力量具备重要性,不过其理论分析的重点,依旧是物质实力的分配与变化情况。

1.2 霸权稳定的运行机制

吉尔平的理论框架里,霸权稳定借助一套复杂运行机制达成。该机制核心是霸权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来换取模式内其他国家的服从与合作。

吉尔平以经济学里的公共产品概念为参照,把国际公共产品划分成了三类。一是建立在最惠国待遇、无条件互惠基础之上的自由开放贸易制度,二是稳定的国际货币模式,三是国际安全。霸权国身为这些公共产品的主要供给方,要去承担相应的成本。就好比在安全领域,霸权国得维持远远超出自身防御所需的军事力量,以此来保障国际航运要道的安全,威慑潜在挑战者。

然而,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非竞争性这两个特性,必定会引发“搭便车”现象,也就是说其他国家在享受霸权国所提供的公共产品时,却不愿意去分担相应的成本。吉尔平指出,这是霸权国不得不面对的一种困境,同时也是霸权最终走向衰落的其中一个根本原因。霸权国为了维持体系稳定,往往需要过度扩张其承诺与义务,导致资源消耗超过收益,最终陷入相对衰落。

1.3 霸权周期与体系变革

吉尔平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于霸权周期与体系变革的论述。他认为,霸权的兴衰遵循着周期性规律,这一周期通常包含崛起、主导和衰落三个阶段。

在国家崛起的阶段,潜在的霸权国家会借助技术创新、制度改革等手段达成经济的快速增长,逐步累积起超越其他国家的实力优势。当该国的实力达到一个临界点,也就是能够重塑国际规则与秩序的时候,便步入了主导阶段。吉尔平着重指出,霸权国家不但要拥有物质实力方面的优势,还得具备“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也就是说要乐意去推动开放国际经济模式的建立。

吉尔平认为霸权衰落属于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其衰落缘由包括内部与外部因素,内部因素含报酬递减规律,即伴随霸权扩张,维持现状的成本相较于维持现状的财政支持能力,上升速度更快,外部因素主要是“搭便车”行

为致使霸权国负担加重、挑战者崛起改变了国际力量对比。吉尔平表明,当霸权国发觉维持现状的成本超出收益时,会选择收缩战略,此通常标志着霸权衰落的起始。

霸权稳定论当中颇具争议的命题之一便是霸权衰落必定会引发霸权战争。吉尔平指出,国际模式结构跟权力再分配之间存在不平衡,而这种不平衡主要借助战争予以解决,“霸权战争在历史上向来是世界政治模式变革的基本机制”,此命题把霸权周期和国际暴力紧密关联起来,也给该理论带来了最为激烈的批评。

2 理论层面的批判:霸权稳定论的内在矛盾

吉尔平的霸权稳定论虽然逻辑严密、体系完整,但其理论建构本身存在多重内在矛盾,这些矛盾致使其理论的解释力、预测力被削弱。该部分会从权力与合法性之间的关系、公共产品供给所呈现出的悖论、霸权周期与战争必然性的论证这三个方面,对霸权稳定论所存在的理论缺陷展开分析。

2.1 权力与合法性的分离:霸权稳定的脆弱基础

吉尔平理论存在一个根本性的缺陷在于过度看重物质性权力而相对忽视了合法性维度。虽然吉尔平有时也会提到霸权国应当“遵循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可是其理论分析的重点一直都放在诸如军事、经济等方面的物质力量上。这种对权力的狭隘理解导致霸权稳定论无法充分解释国际秩序的持久性问题。

周丕启针对霸权衰落根源展开的研究揭示出了这一理论中存在的盲点。他认为,霸权的衰落不仅是物质力量的衰落,还包括“对国际系统进程的主导作用的降低”,后面这种情况常常跟合法性危机联系紧密。历史经验表明,缺乏合法性的霸权即使拥有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难以维持长期稳定。例如,冷战时期的苏联尽管在军事上与美国形成均势,但其霸权模式因缺乏合法性基础而最终崩溃。反观二战后的美国霸权,其在 20 世纪 70 年代物质力量相对下降后仍能维持主导地位,部分原因在于其建立的国际制度体系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合法性认同。

合法性危机的根源在于霸权国利益与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之间的潜在冲突。吉尔平承认,霸权国建立国际秩序的出发点是自身利益,但同时强调这种秩序也应为其他国家提供“共同利益”。然而,当霸权国滥用其主导地位,将自身利益凌驾于国际共同利益之上时——如 2003 年美国未经联合国授权发动伊拉克战争——其霸权合法性就会受到侵蚀,从而导致国际秩序的动荡。霸权稳定论未能充分纳入合法性变量,使其难以解释霸权在物质力量衰落前就可能

出现的秩序危机。

2.2 公共产品的悖论：供给、需求与霸权负担

吉尔平借鉴公共产品理论分析霸权稳定的运行机制，但这一分析框架存在内在悖论，削弱了其对霸权行为的解释力。

首先，国际公共产品的界定本身存在问题。吉尔平列举的三类公共产品——自由贸易制度、稳定货币和国际安全——是否真正具有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征，值得商榷。以自由贸易制度为例，霸权国推动的贸易规则往往反映其自身比较优势，对发展中国家可能产生排斥效应，事实上，霸权国提供的许多“公共产品”具有明显的选择性，主要服务于自身及其盟友的利益。这种选择性的供给模式使“公共产品”概念在国际关系中的应用变得复杂而模糊。

其次，吉尔平关于霸权国愿意承担公共产品供给成本的分析过于简化。他认为，霸权国的成本-收益计算使其有动机提供公共产品。然而，这种计算在现实中极为复杂，涉及短期与长期收益、物质与非物质收益、国内与国外收益之间的权衡，特别是在民主国家，国内政治压力常常限制政府承担国际公共产品成本的意愿和能力。²¹ 世纪以来美国国内日益增长的孤立主义倾向，就反映了霸权国内部对承担国际责任的态度变化。

最为关键的是，吉尔平的公共产品分析框架无法解释“后霸权”时代的国际合作情况作出合理的解释。罗伯特·基欧汉在《霸权之后》中指出，国际制度在霸权衰落后仍可能持续运作，因为各国意识到合作比冲突更能促进共同利益。这一观点对霸权稳定论发起了直接挑战——如果国际秩序全部依靠霸权国来提供公共产品，那么当霸权衰落之时，国际秩序理应会迅速瓦解才对；但现实是，在美国的相对实力有所下降以后，许多国际制度依然能够维持基本运转。这表明，国际秩序的维持可能有超越霸权供给的多元基础。

2.3 霸权周期与战争必然性：循环论证与历史简化

吉尔平关于霸权衰落必然导致霸权战争的命题，是霸权稳定论中最受争议的部分。这一命题不仅在理论上存在循环论证的问题，也与历史经验不完全相符。

从理论逻辑看，吉尔平所进行的论证带有一定的目的论色彩。他首先预先设定霸权战争是国际模式变革的基本机制，之后又把历史上出现的大国战争解释为霸权战争，以此“证明”霸权战争的存在、必然性。这种论证方式在逻辑方面上并不够严谨周密，也忽略了战争原因具有的多

重性。

从历史经验看，霸权转移并非总是借助全面战争来达到。Houweling 和 Siccama 的研究表明，吉尔平所提出的全球战争时期比霸权间隔期更严重的观点“在经验方面是有误的”。他们针对近现代国际模式展开实证分析后发现，权力转移致使全球战争发生需要特定条件，尤其是挑战国的政治经济性质方面，如果挑战国属于民主国家、贸易国家，则权力转移有可能以和平的方式推进。这一发现对吉尔平的战争必然论形成了直接的挑战。

历史上有不少霸权和平转移或非战争衰落的案例。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英国霸权向美国转移的进程里，虽然伴随着紧张与竞争，然而两国之间并没有爆发直接的战争；冷战结束之后苏联霸权走向解体，同样也没有引发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全面冲突。从这些案例能够看出，霸权更替有着多种多样的路径，战争仅仅是其中的一种路径而并非必定会出现的结果。吉尔平的理论简化了霸权转移的复杂性，未充分考虑国际制度、经济相互依存关系、核威慑等能够抑制战争的因素。

3 历史经验的检验：霸权稳定论的实证困境

理论的价值体现在逻辑自治，更在于对实际发生的现象的合理阐释。吉尔平的霸权稳定论虽借助历史上诸多事例来佐证其观点，但对这些事例的剖析存有片面性，不能全面考虑丰富多样的历史经验。下面将通过“不列颠治下的和平”“美利坚治下的和平”，后霸权时代的国际秩序予以审视，评估霸权稳定论的历史解释力。

3.1 “不列颠治下的和平”：被简化的霸权叙事

吉尔平将 19 世纪的国际秩序描述为“不列颠治下的和平”，认为英国霸权通过提供海军安全、自由贸易和金本位制等公共产品，维持了相对稳定的国际体系。这一历史解读虽然有一定依据，但过度简化了 19 世纪国际关系的复杂性。

19 世纪国际稳定产生并非是因为英国单极霸权，而是多极均势与霸权主导一起发挥作用导致的。维也纳会议之后欧洲协调机制建立起来，俄奥普法等大国间力量形成平衡，这对维持欧洲和平作用关键。英国海军具有优势，确实能保障全球航运安全，但陆军力量存在局限，无法单独维持欧洲大陆和平。实际上，19 世纪几次重大国际危机爆发，像 1853-1856 年的克里米亚战争、1870-1871 年的普法战争，都是英国没能干预或者不愿意干预的时候发生的。这说明英国霸权稳定效应在地域和议题方面存在明显限制。

其次,英国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带有显著的选择性、自利性特征。英国推动自由贸易的主要目的在于发挥自身工业方面的优势,并非单纯促进全球福利。当自由贸易与自身利益不符的时,就像在 19 世纪 40 年代废除《谷物法》之前的情况那样,英国会毫不迟疑地采取保护主义政策。

英国霸权的衰落进程并非全然与吉尔平的霸权稳定论观点相符,这点更为关键。19 世纪 70 年代之后,英国相对经济实力出现了下降,可是其主导的国际秩序并未立刻崩塌。自由贸易模式依靠金本位制持续运行,国际安全方面也没有出现系统性危机的情况。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霸权下的国际秩序才真正走向瓦解。这一时间差表明,霸权衰落和国际秩序动荡之间不存在即刻且必然的因果联系。

3.2 “美利坚治下的和平”:霸权稳定的多重悖论

二战后的美国霸权被吉尔平视为霸权稳定论的又一例证。然而,深入分析“美利坚治下的和平”可以发现,这一时期的国际稳定与吉尔平的理论预期存在显著偏差。

美国霸权之下的国际秩序乃是建立于三大支柱基础之上,分别为军事同盟模式、布雷顿森林机构、自由贸易制度。和吉尔平的理论预期不一样,此秩序的稳定并非全然依靠美国单方面提供公共产品,而是借助制度化的合作安排来分担责任与成本。比如说,北约的安全保障虽然是以美国军力作为核心,然而欧洲盟国同样也提供了重要的基地、人力、财政方面的支持。这样的制度化合作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搭便车”问题,同时也延长了美国霸权的存在时长。

冷战所特有的背景使得霸权稳定论的适用性变得更为复杂。在两极对峙的格局当中,美国和其盟友之间的安全相互依存程度处于极高的水平,这既强化了霸权国提供安全公共产品的动机,也提高盟友“搭便车”的空间。可是,这样一种高度对抗的国际环境本身并不契合吉尔平理论里“霸权带来稳定”的基本命题,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期间,全球一直被核战争的阴影所笼罩,局部冲突持续不停。霸权稳定论很难解释为何在霸权存在的情况下国际模式依然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

在步入 21 世纪之后,美国霸权的演变路径和吉尔平的理论预测存在明显差异。按照霸权稳定论的观点,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了唯一的超级大国,照理说应当建立更为稳定的国际秩序。但实际的情形却是,处于单极时刻的美国推行了扩张性更强烈、约束性更少的外交政策,由此引

发了一系列的国际危机。2003 年爆发的伊拉克战争,不但削弱了美国霸权的合法性,还破坏了联合国等多边制度的权威。这一实例表明,缺少制衡的霸权有可能成为国际不稳定的根源,而并非保障。

3.3 后霸权时代的秩序韧性:超越吉尔平的预期

吉尔平理论的一个关键弱点是无法解释霸权衰落后国际秩序的持续性。按照其逻辑,霸权一旦衰落,国际体系应迅速陷入动荡,直至新的霸权崛起。然而,21 世纪的国际现实对这一假设提出了挑战。

美国的相对实力的确处于下降趋势,这体现在多个维度之中。在经济方面,美国在全球 GDP 中所占的比重,自冷战结束之时起,便从大约 30% 逐渐下滑至 2020 年的约 24%。在军事方面,尽管美国的军费开支依旧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然而其军事优势在某些局部地区却遭遇了挑战。在制度领域,由美国主导的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正面临着改革的压力。然而,国际秩序并没有如吉尔平所预期的那样出现系统性的崩溃。自由贸易模式尽管受到了保护主义的冲击,但是全球价值链依旧在持续运转。国际安全机制虽然其效能有所下降,不过大国之间仍然维持了基本的危机管控。全球治理尽管进展比较缓慢,可是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领域依旧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合作。

这一“秩序韧性”现象存在多方面原因。首先,国际制度具有路径依赖效应,致使诸多规则和安排在美国霸权削弱后依旧能够持续运行。各国已适应现有制度框架,虽然主导国影响力有所下降,然而彻底推翻既有制度所需成本常常高于收益。权力分散并未引发彻底无序,而是催生出更为复杂的多边互动模式,在缺乏单一霸权的情形下,大国协调、区域合作、跨国网络成为维持秩序的重要补充方式。

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崛起道路,和吉尔平的理论预期存在差异。依据霸权稳定论,崛起国往往会挑战现存霸权,使模式陷入动荡。然而中国清晰地提出了“和平发展”战略,表明不会谋求霸权,倡导以“共商共建共享”的方式改革全球治理。尽管中美之间的竞争有所加剧,可是两国在经济、气候变化等方面的合作仍在持续。这种既含有竞争又包括合作的复杂关系,突破了霸权稳定论那种简单的“霸权-挑战者”二元框架。

4 霸权稳定的替代模式:超越吉尔平的理论局限

对吉尔平霸权稳定论的批判并非意味着否定国际秩序

稳定性的理论价值,而是为了超越其理论局限,探索更具解释力和规范意义的替代模式。本节将探讨多元稳定模式、制度主义路径以及中国视角下的秩序观念,为理解当代国际秩序提供新的理论框架。

4.1 多元稳定模式:权力、制度与观念的复合框架

吉尔平理论的单因决定论——霸权决定稳定——忽视了国际秩序的多维基础。实际上,国际稳定是权力分配、制度设计和观念共识共同作用的结果,多元稳定模式试图整合这些要素,提供更为全面的分析框架。

在权力这一维度方面,多元稳定模式认可权力集中对于秩序有着重要意义,不过更注重权力形态具备多样性。除了物质性权力之外,制度性权力也就是制定、修改国际规则的能力、话语权力即塑造国际议程和叙事的能力,同样会对国际稳定产生影响。不同权力形态所形成的组合,决定了霸权国家或者主导国家的行为方式、其合法性的程度高低。就好比战后美国霸权取得相对成功,一方面源于其军事、经济方面的优势,另一方面和其借助国际制度来行使权力的方式相关,这种以制度化形式存在的霸权,相较于单纯依靠强制力的霸权而言,更具持久性。

在制度维度上,多元稳定模式强调国际制度的独立作用。与吉尔平的“霸权创造制度”观点不同,制度主义理论认为,国际制度一旦建立,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创建国的权力而运作。制度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供信息、塑造预期等功能,促进国家间合作,即使霸权衰落,制度仍可继续支撑国际秩序。欧盟的发展历程是制度维度的典型案例:虽然欧洲一体化初期有美国的支持和推动,但随着制度网络的深化,欧盟形成了自主的治理结构和凝聚力,即使在美国影响力相对下降的情况下,仍能维持区域稳定与合作。

在观念这一维度方面,多元稳定模式着重关注共享价值观、集体认同对于国际秩序所起到的建构作用。建构主义理论表明,观念结构能够塑造国家身份与利益,进而对国家行为、国际秩序产生影响。比如民主国家之间出现的和平现象,有一部分原因是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共享,这种共享观念使得彼此间的威胁感知有所降低,推动了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观念维度对权力和制度分析起到了补充作用,解释了为何相似的权力结构、制度设计会产生不同的秩序效果。

多元稳定模式所建立的复合框架相较于吉尔平提出的单一霸权逻辑,对于诠释当代国际秩序的复杂性具备更强的解释力。在此框架模式之中,霸权仅仅是影响国际稳定

的其中一个因素而已,并非唯一的或者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国际秩序所具备的韧性源自于权力、制度、观念这多个方面的支撑,虽然在某一个维度发生了变化,其他维度依然能够给予一定程度的稳定性。这一点同时也说明了美国相对衰落却并未致使国际秩序走向崩溃的原因——制度和观念维度起到了一定的缓冲作用并具备延续性。

4.2 中国视角:天下观与新型国际关系

对吉尔平霸权稳定论的批判和超越,不应仅限于西方理论内部的争论。非西方国际关系思想,特别是中国的秩序观念,为思考后霸权时代的国际稳定提供了独特视角。天下观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重要概念,强调“天下一家”的整体性和包容性,与基于国家间竞争的霸权逻辑形成鲜明对比。

天下观的核心理念为“和而不同”的秩序观念,即追求和谐却不寻求完全一致,尊重差异但又维护整体的协调关系。这种理念反映在当代中国提出的“新型国际关系”主张里面,包括相互尊重、秉持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等多项原则。和吉尔平的霸权稳定论不一样,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国际秩序,并不会预先设定由单一国家主导,而是着重强调各国共同参与到全球治理当中,借助对话协商的方式来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依靠合作共赢达成发展的目标。

中国所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为国际秩序给出了有别于霸权模式的替代选择。此方案着重指出,规则制定应当经由各国平等协商来完成,而不是进行强行施加,发展成果理应让所有国家受益,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国际公共产品应由各国一同来提供,而非由单一国家独自承担。在实际践行过程里,“一带一路”倡议试着借助发展合作这种方式,而非依靠安全强制手段,以此来推动区域稳定,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多边机构试着对传统国际金融治理模式予以改革,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里所扮演的积极角色,促使了《巴黎协定》得以达成并付诸实施。

中国视角面临着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挑战。在理论方面,怎样把传统天下观和现代国际关系概念结合起来,去建立系统化的理论框架,这依旧是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在实践方面,中国怎样平衡自身发展需求与国际责任,怎样处理与现有霸权国的关系,怎样应对周边国家的疑虑,这些都是实现新型国际关系理念必须要面对的难题。但这些挑战也体现出国际秩序转型具有复杂性,提醒我们任何单一理论模式都不能充分把握这一进程。

5 结语

吉尔平的霸权稳定论作为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

关键部分, 阐明了霸权国在国际秩序稳定中的特殊作用, 并揭示了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该理论对 19 世纪英国霸权和 20 世纪美国霸权下的国际秩序具有一定的解释效力。然而, 本文分析表明, 吉尔平的理论存在根本性缺陷, 难以充分解释复杂多变的国际现实。在理论层面, 它过度简化了权力与稳定的关系, 忽视了合法性维度, 并陷入供给 - 需求悖论。在实证层面, “不列颠治下的和平” 和 “美利坚治下的和平” 并不如其描绘的那般理想, 且霸权更替路径多样化。随着美国相对实力下降和中国等新兴力量崛起, 国际模式正经历深度调整。在这种背景下, 坚持霸权稳定的思维方式既不符合实际, 还可能引发误判和冲突。未来研究应探讨国际公共产品的多种供给机制、霸权合法性的来源与维持、权力转移的和平管理机制以及非西方秩序观念的现代转化, 以推动更全面理解国际秩序并为全球治理提供理论指引。

参考文献:

- [1] Gilpin, Robert.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 [2] Houweling, Henk, Jan G. Siccama.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n Analysis of the Systemic, Dyadic, and Actor-Level Approaches[J].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985, 29(1): 36-62.

[3] Kindleberger, Charles P.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4] Keohane, Robert O.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5] 王缉思. 国际政治的理性思考[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6] 阎学通, 阎梁. 国际关系分析[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7] 张宇燕, 李增刚. 国际经济政治学[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8] 周丕启. 霸权稳定论: 批判与修正[J]. 国际政治研究, 2005(01): 45-55.

作者简介: 张伟杰 (2003.03-), 男, 河南南阳人, 硕士研究生, 学生, 研究方向: 国别和区域研究。